

研究論文

公共輿論能左右知識生產嗎？ 胡鞍鋼教授的案例研究

劉宇^{a*}、孫凱騁^a

^a 雲南大學新聞學院，昆明市，中國大陸

摘要

學術自主性是知識份子進行自我反思時的一個古老問題，現有研究主要探討政治、經濟等強因素對知識生產的影響，鮮有文獻關注「社會公眾」這一主體，更缺乏相關實證研究展示學術與社會如何互動。論文以胡鞍鋼教授因「中國超越美國論」引發2018年清華校友聯名呼籲清華校方免除其所擔任職務這一公共輿論事件為例，利用合成控制法考察該事件對胡教授事後知識生產與傳播效率的因果效應。研究發現，該事件雖並未顯著降低胡教授的科研產出，但顯著削弱了其學術影響力，且這一負面影響有持續增強的趨勢。研究表明，傳統上認為社會公眾在與學術的互動過程中居於被動地位的觀點存在一定片面性，社

劉宇（通訊作者*），雲南大學新聞學院教授。研究興趣：政治傳播、學術傳播、知識生產。電郵：histly@hotmail.com

孫凱騁，雲南大學新聞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興趣：政治傳播、學術傳播、信息計量。電郵：skc565427839@163.com

論文投稿日期：2025年2月16日。論文接受日期：2025年9月5日。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00期（2026）

會公眾可以更加積極地通過公共輿論監督學者，敦促其秉持價值中立的原則進行基於事實的知識生產。

關鍵詞：公共輿論、知識生產、學術自主性、學術自由、合成控制法

Research Article

Can Public Opinion Influence Knowledge Production? The Case Study of Professor Hu Angang

Yu LIU ^{a*}, Kaicheng SUN ^a

^a School of Journalism,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Mainland China

Abstract

Academic autonomy has long been a catalyst for intellectual self-reflection. Existing research predominantly explores how dominant factors such as politics or economics shape knowledge production. However, there is limited literature examining society's impact on this process, and even less empirical research investigating the dynamic interplay between academia and society. This paper employs the “2018 Professor Hu Angang Incident” as a case study to illuminate the consequences of society leveraging public opinion as a tool to influence knowledge production. In 2018, Professor Hu Angang faced calls from Tsinghua alumni to resign from his positions following his assertion that “China has surpassed the United States.” Using synthetic control methods,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causal effects of this incident on Professor Hu's post-event

Yu LIU (Professor, Corresponding Author*). School of Journalism, Yunnan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knowledge production. Email: histly@hotmail.com

Kaicheng SUN (Ph.D. Student). School of Journalism, Yunnan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informetric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Email: skc565427839@163.com

Article History: Received on 16 February 2025. Accepted on 5 September 2025.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dissemination efficiency.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while the incident did not significantly reduce Professor Hu's research productivity, it substantially diminished his academic influence, with this negative effect exhibiting a trend of continuous intensification. The study challenges the conventional view of society as a passive actor in its interactions with academia, arguing that society can play a more proactive role in supervising scholars through public opinion. Such oversight can help uphold the principle of value neutrality and encourage the academic community to produce research grounded in empirical evidence, rather than blindly aligning with non-academic factors such as political agendas.

Keywords: public opinion, knowledge production, academic autonomy, academic freedom, synthesis control method

引言

學術研究是一種求真、求實的活動。社會公眾也普遍認為，「為了求真和求實，知識份子在個人榮辱、利害、得失面前，不願向險惡的政治勢力妥協」（張錫金，2001）；學術界也一直被認為是「批判社會醜陋現象的堡壘」（鄧正來，2004）。然而，理想很豐滿但是現實往往很骨感。即便是在以客觀性為基本準繩的自然科學中，各種政治的、經濟的或意識形態的非學術性因素往往也會滲透到知識生產領域（拉圖爾、伍爾加，2004：161–162）；在主觀性相對更強的人文社會科學領域，非學術性因素對知識生產的影響尤為嚴重，鄧正來（2007）稱之為「學術自主性問題」。雖然已有大量文獻討論政治、軍事、經濟等因素對知識生產的影響（Bakker et al., 2010; Sohn, 2021），但鮮有研究關注普通的社會公眾與知識生產之間的關係。通常來說，社會公眾與學術之間的互動有兩種基本形式：一是社會公眾作為知識產品的消費者，吸收學術界輸出的知識，形成普遍性的社會觀念或思潮；二是社會公眾作為研究對象，以社會現象或社會問題為載體引發學術界的研究興趣，從而左右知識生產。在這兩種基本的互動模式中，社會公眾都處於一種被動的狀態，要麼等待著學術精英的智識教育，要麼等待著學術精英的關注。那麼，社會公眾作為一個行動主體能否主動影響學術界的知識生產與傳播，這正是本文所關注的核心問題。本文以2018年清華大學校友以公開信形式呼籲清華大學開除胡鞍鋼教授事件為例，¹ 分析社會公眾如何通過公共輿論這一形式主動影響學術界的知識生產與傳播，從而深化人們對社會／公眾與學術之間如何互動的理解。

文獻綜述

政治與知識生產的自主性

學術自主性成為知識份子自覺反思的一個學術性問題，可能起源於韋伯（Max Weber）在《以學術為志業》（*Wissenschaft Als Beruf & Politik Als Beruf*）中系統討論「在課堂裏沒有政治的位置」（2004：25–27）。如何處理政治與學術之間的關係，其實是一個古已有之的老問題。古希

臘哲人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說：「我寧願找到一個因果性的解釋，也不願獲得一個波斯王位。」（轉引自張錫金，2001：163）近代社會更是有愛因斯坦拒絕出任以色列總統這樣的科學史佳話。可見，西方知識份子一直存在著比較強烈的「以學術為志業」的價值取向和傳統，這會促使其在知識生產中保持較強的學術自主性，主動對非學術性的干擾因素進行免疫。

與西方知識界不同的是，自古以來，中國的學術與政治緊密捆綁在一起。古代中國社會是以政治權力為軸心的高度「一體化」社會（金觀濤、劉青峰，2010：31-33），因此「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就成為知識份子生存的一條重要出路。隨著科舉制度在中國社會的確定，「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為每個讀書人的職業夢想，「學而優則仕」的觀念牢固地紮根於中華大地。因此，中國的知識份子向來積極主動地投向政治的懷抱，學術成為讀書人追逐功名利祿的工具。正如許成鋼所述，「國人在開始做學問的時候，腦子裏想的不是認識世界而是為了升官」（2021：47）。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中國的知識生產向來缺乏必要的自主性和獨立性。

中國社會科學的自主性問題之所以被提出，是為了反思改革開放前三十年社會科學的意識形態化、以及知識份子獨立人格基本喪失的困境。中國社會科學的自主性包含兩個基本問題：從一般性來講，即學術場域相對於其他場域的自主性，即「中國社會科學場域依照其運行邏輯而必須與經濟場域、社會場域和政治場域做出明確的界分」；從本土性來講，「中國社會科學場域在世界結構下必須自主於西方社會科學場域『文化霸權』的問題」（鄧正來，2004：7）。

從中國學術發展的現實出發，雖然20世紀50年代以來中國學術界在全球學術視域中居於消費者地位，基本上處於沒有原創成果問世的「學術貧困」狀態（任劍濤，2007）；但是，國際間的學術交流對中國學術事業的促進作用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因此相對來說，學術自主性的第一層要義即如何處理政治和學術之間的關係才是中國學術自主性的核心問題。

學術與政治之間的良性關係，建立在兩者之間的規範性互動基礎之上，即學術以自身的價值取向和科學標準將政治關心的議題上升為研究議題；而不是政治對學術的單向實用性把控，即政治通過資源配

置使學術淪為替政治決策提供合理性論證的學理工具。然而，在政治與學術的互動實踐中，政治往往通過一系列的制度設計，強化學術在「生產正當性制度安排之知識」上的功能，而有意遏制學術作為「批判社會醜陋現象的堡壘」的公共職責（鄧正來，2004）。

「1949年以後，國家治理社會所依憑的一個最為重要的制度性安排即對知識生產和傳播的國家壟斷，包括意識形態的支配性安排」（鄧正來，2000：7）。在知識生產領域，政府通過各種手段將所有教育機構和科研機構國營化，並通過工作單位實現了對各類知識生產者基於單位統屬的職業化和制度性約束（路風，1989）。在知識傳播領域，通過對出版社、報刊社、新華書店、郵發系統等機構的國有化，在出版發表環節實行的「三審制」以及在發行流通環節的「再審查」，實現了「對於知識流通的壟斷性控制」（鄧正來，2000）。國家採用這兩種方式，造就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知識生產與傳播生態。

1978年以來，改革開放主要集中在經濟領域，其他領域的改革進展緩慢（秦曉等，2009）。由國家、機構和知識份子三者構成的中國知識生產的主體結構並未發生根本性的轉變，即國家依然扮演著知識生產設計者、資源配置者與知識成果決定性購買者的角色（任劍濤，2005：112）。國家通過機構或單位對知識生產和傳播過程進行單位制的制度化制約，「理論宣傳是中國知識生產的既有主導力量……現代知識生產的共同體評價幾乎也完全被國家意識形態主導的政治評價所代換」（任劍濤，2005：112）。進入1990年代之後，隨著項目製作為一種國家治理體制的普遍推行（渠敬東，2012），國家通過「211工程」、「985工程」、「雙一流建設」等高等教育發展政策，加強了國家對知識生產機構的控制和約束，通過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等研究課題的項目化運作強化了科學研究服務於國家建設需求的功能，同時也增強了國家對知識生產者個體的激勵和約束。

在這樣的制度化環境下，學者的知識生產很難保持學術自主性，處在既要「研究自由又要國家包養」的悖論式兩難窘境（閻光才，2010）。在知識生產的目的論上，人文社會科學的知識份子一直在純粹的知識追求與務實的政治需要之間進行撕裂性的拉扯。一些學者甚至主動將知識生產作為純粹的謀生手段，「習慣於在知識之外的政治、社會標準上去尋求知識生產的原則」（任劍濤，2005：115）。在當下，「『策論凸顯』

是籠罩在學術界的一片烏雲」(孫國東, 2018: 17), 附庸於政治需要的知識生產隨處可見, 如近十年甚囂塵上的無序化智庫研究, 以及諸多高校已經將獲得省部級及以上領導批示的決策諮詢報告折算成相應級別的研究論文, 並納入到職稱評定、學術評獎等學術評價活動之中; 這些政治左右學術的現象表明, 以政治為旨歸的學術旨趣「似乎已通過學術資源、學術地位和學術榮譽等的配置而深嵌於學術評價體制中, 儼然成為當下中國學術研究的結構化情境」(孫國東, 2018: 17)。

胡鞍鋼教授學術生涯的沉浮起落, 正是中國知識生產制度情境下充分反映學術自主性問題的一個典型案例。通過對該案例細緻分析, 我們不僅能夠清晰地觀察在政治與學術的互動過程中, 國家和學者兩大行動主體所展現出的理性行為邏輯, 也可以看到社會作為相對獨立於國家的行動主體, 在其與學術的互動中自身的價值追求。

輿論對知識生產的影響

本質上來說, 學者的生存基礎是其知識貢獻。然而, 知識貢獻的準確測量有待歷史檢驗, 需要長時期的時間沉澱; 因此, 在現實操作層面, 學術界通常只能依據學者的科研績效進行資源配置。目前, 科研績效的測量主要依據研究人員的知識產出(如發表數量)與學術影響力(如成果的被引次數)。已有大量文獻關注科研績效的影響因素, 這些因素主要聚焦在學者的個體特徵及其工作機構的組織特徵, 從微觀(如性別、個體感知壓力、學術抱負、職業經歷等)和中觀(如激勵政策、工作氛圍等)層面解釋科研績效背後的驅動機制(李鋒亮、王雲斌、何光喜, 2016; 黃海剛、連潔, 2020; 楊希、李歡, 2021; Bao et al., 2023; Petersen et al., 2014); 鮮有研究從宏觀視角切入, 實證考察不同場域之間的互動對學術運作的影響。

目前, 有一些研究關注科研獲獎對學者科研績效的影響。雖然科研獲獎本身仍然屬於學術界內部的制度運作, 但是, 像諾貝爾頒獎之類的重要科學獎項的授予已經成為社會普遍關注的公共事件。因此, 研究諾獎得主在獲獎前後學術產出和影響力的變化規律, 有助於在一定程度上展示公共輿論對學術運作的影響, 幫助人們了解學術與社會之間的互動。

探討獲獎事件對獲獎者科研績效的影響效果，現有實證研究並未取得一致性的研究結論。第一類研究發現獲得獎項或稱號對獲獎者的科研績效具有提升作用 (boosting effect)，產生這一效果的原因是科學運作的馬太效應和聲譽的光環效應 (Liao, 2021; Merton, 1968)。如 Mazlounian 等人 (2011) 以 1990 至 2009 年間獲得諾獎的 124 位學者為研究物件發現，獲獎之後不僅獲獎者的獲獎成果顯著獲得了更高的被引用率，在獲獎前所發表的其他論文的被引率也顯著提高。Dong 等人 (2023) 使用物理學諾獎得主所發表的論文為實驗組，美國物理學學會主辦期刊的同主題論文為控制組，研究發現，在獲獎之後實驗組論文的被引次數會顯著增加，而相同主題的控制組論文的被引次數變化並不顯著，作者將這一現象稱為諾獎引用效應 (Nobel citation effect)。Çakir 與 Richter (2023) 研究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作品被翻譯為他國文字的變化也發現了相同的效應。除了諾獎得主的研究之外，針對其他重要獎項獲得者的研究也大多發現了獲獎的提升作用。如 Chan 等人 (2014) 對經濟學界克拉克獎 (John Bates Clark Medal) 獲得者的研究，發現在獲獎五年後的科研產出增加了 13%，被引量增加了 50%。Liu 等人 (2018) 發現獲得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稱號的學者在被評選上之後，有更高的論文產出與平均被引量。

第二類研究發現獲獎與科學家的科研績效之間沒有必然的因果聯繫，獎項僅僅是對里程碑式貢獻的認可，並不會對獲獎科學家後續的科研績效產生顯著影響。李江等人 (2014) 通過繪製 341 位諾獎得主的引文曲線，發現引文曲線的突變時間在獲獎時間前後的分佈並無顯著差異，進而認為獲獎對諾獎得主的被引次數並不會產生顯著影響。鮑玉芳等人 (2015) 以諾貝爾化學獎、物理學獎得主為研究物件，發現獲獎前後的論文平均被引次數沒有顯著差異。Bricongne (2014) 以經濟學諾獎得主為研究物件，發現獲獎並不能顯著增加諾獎得主的科研產出。此外，Hou 等人 (2021) 以普賴斯獎得主為物件的研究也發現了相似結論。

第三類研究發現獲獎對學者的科研績效會產生負向影響。如 Ibrahim (2020) 發現儘管獲得埃及國家獎能增加獲獎者的被引量，但是獲獎之後學者個人的科研產出會顯著降低。這是由於科學榮譽給獲獎者帶來的更多的社會負擔，減少了其對科研的投入。Borjas 等人 (2015) 發

現獲得菲爾茲獎 (Fields Medal) 的數學家在獲獎後會選擇研究不熟悉領域的議題，從而導致論文產出下降。

通常來說，獲獎能夠提升科學家科研績效的結論更符合人們的常識，也容易從馬太效應的邏輯中得到有效解釋；然而，科學家科研績效的積累和變化也同樣會受到年齡、知識更新、聲譽負擔等其他因素的影響 (高志等，2016)。未能排除干擾性因素對科研績效的混雜效應，是獲獎與科研績效之間關係未能取得一致研究結論的重要原因。

科研獲獎雖然在學術界具有一定的公共輿論事件性質，但是它本質上仍然是以學術界內部的運作規則為基本邏輯，無法直面回答按照社會公眾訴求產生的公共輿論是否會影響學術運作這一問題。胡鞍鋼事件恰恰為我們研究這一問題提供了契機，通過對比胡鞍鋼教授本人在該事件前後科研績效的差異，可以讓我們直面中國社會公眾的訴求是否會直接影響學術界運作這一議題，檢驗中國社會科學界的學術自主性問題。

案例介紹與分析

本文根據BBC、¹ 百度百科、² 維基百科、³ 鳳凰網、⁴ 清華大學胡鞍鋼教授的個人主頁⁵等資訊源對其人其事進行簡要的介紹。

胡鞍鋼，1953年4月27日生於遼寧省鞍山市，出身於一個知識份子家庭。1977年，胡鞍鋼參加了高考，被唐山工學院錄取。先後在河北工學院取得工學學士學位、北京鋼鐵學院 (現為北京科技大學) 取得工學碩士學位。隨後，胡鞍鋼進入中國科學院自動化研究所，在周立三院士的領導下進行研究，並於1988年獲中國科學院工學博士學位。

從1985年起，胡鞍鋼參加了由周立三院士領導的中國科學院國情分析研究小組，並作為主要研究人員系統地從事中國國情研究。1988年底，中科院國情分析小組的1號國情報告《生存與發展》正式完成，這份報告最終得到鄧小平同志的閱讀並予以肯定，自動化研究所博士生胡鞍鋼以學術素人的身分初次嶄露頭角。1991年，胡鞍鋼被國家教育委員會、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授予「有突出貢獻的中國博士學位學者」。

1993年，胡鞍鋼與王紹光合著的《中國國家能力報告》的摘要在新華社內部發表後，再一次引起決策層的高度關注。在報告中，他們指

出財政汲取能力是四種國家能力之首。這一論斷切中當時中央財政之痛，為1994年之後的「分稅制」改革提供重要背景和參考依據。該項研究也奠定了胡鞍鋼在學術界的地位。1994年，胡鞍鋼獲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的「國家傑出青年科學基金」；此後，又陸續獲得中國科學院科技進步一等獎、國家科技進步三等獎等各類重要政府獎項。

此後，胡鞍鋼一直秉持以國家意志為導向的主流學術，並試圖尋找和證明中國模式比西方模式的優越之處。1997年，胡鞍鋼預測「到2015年，中國將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實體和貿易大國」（胡鞍鋼，1997：14）。此後，又先後發表了《中國崛起與對外開放：從世界性開放大國到世界性開放強國》、《從政治制度看中國為甚麼總會成功》、《中國2020：一個新型超級大國》、《人民社會為何優於公民社會》、《集體領導體制的政治優勢》、《中國高技術產業為何趕超美國》、《國有企業：保障國家財政能力的重要基礎》等論著。「2017年時，胡鞍鋼經過長期計算，得出了驚人結論——早在2010年時，中國的綜合國力就已經超過美國，達到了美國的1.04倍；到2020年時，中國的綜合國力相當於美國的1.75倍；到2030年，中國的綜合國力就相當於美國的兩倍」。⁴2018年1月，胡鞍鋼入選清華大學首批文科資深教授。

2018年8月2日，清華大學部分校友在網上發表致清華大學校長邱勇的公開呼籲書，要求清華大學免除該校胡鞍鋼教授所擔任的國情研究院院長及教授職務。理由是，「胡鞍鋼先生，拋常識於不顧，視學術為無物，實在有辱斯文。尤其是其拋出的『中國綜合國力已超出美國』的所謂學術報告，可謂上誤國家決策，下惑黎民百姓，遠引無數他國戒心，近發鄰居恐懼。堪稱誤國誤民！」¹

此事在網絡上引發了一場不小的公共輿論，「倒胡」、「挺胡」者皆有之。「倒胡」者批判胡鞍鋼對政治的諂媚，違背了學術研究的客觀性；⁶「挺胡」者認為外行不應以「常識」來評判專家、要尊重內行，胡鞍鋼一貫堅持己見、從不隨波逐流。⁷清華大學校黨委對聯名信做出的第一個回應是致信中央網信辦，要求對輿情實施管控；⁸2019年，作為國家智庫的「中國經濟50人論壇」在吐故納新時換掉了胡鞍鋼。⁹

從胡鞍鋼事件中，我們可以觀察到中國知識生產系統中的四種不同行動主體：國家、單位、學者和社會。國家在知識生產系統中居於

主導性地位，通過資源配置要求知識生產滿足國家能力的構建和強化（任劍濤，2005）。因此，學者和單位在知識生產中具有滿足國家需求的強烈刺激。如馮惠玲所述，「在國家的發展戰略、規劃、趨向、走向、政策這一類事情上，我們總能聽到胡鞍鋼的聲音」。¹⁰ 學者和單位通過滿足國家的知識需求，在國家進行資源配置時佔取先機。在與國家互動的過程中，學者和單位在理性邏輯的驅動下具有利益訴求的一致性。根據清華國情研究院官網，胡鞍鋼「從1998年至今，主編《國情報告》，向中央領導同志和省部級主要負責人累計提供1,700餘期，先後獲得黨和國家領導人批示上百次，對國家發展重要決策產生持續影響」。¹¹ 這突顯胡鞍鋼本人的「官方智囊」特色，同時也彰顯了清華大學的「智庫」功能。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學者個體和所在單位捆綁成了一個向國家爭取資源的利益共同體（劉宇、劉曉豔，2022）。這個共同體在知識生產中容易受到國家的政治影響而忽視學術自主性。

在中國轉向現代國家之際，國家和社會之間產生了疏離（任劍濤，2021）。因此，社會對知識生產的要求與國家對知識生產的要求並不完全一致。社會希冀知識份子具有超然性和介入性，即「必須關切和參與整個社會的公共事務，包括國家的最高政策決策，能夠在一個超個人功利的宏觀立場上領導輿論，批評時政，發揮社會良心的功用」（許紀霖，1988：104）。也就是說，知識份子應該成為國家的監督者和批評者，而不是背書者。清華校友在胡鞍鋼事件中扮演了社會公眾代言人的角色，以公開呼籲書的形式譴責胡鞍鋼以個人利益為動機成為國家政策的背書者和鼓吹者。然而，由於社會無法在經濟和政治上對學者和單位形成實質性硬約束，那麼「社會良心」職能的履行就會基本依賴於學者個人和單位的自覺、缺乏強力激勵因素的刺激。社會僅能使用無形的公共輿論對違背「社會良心」的知識生產進行道德譴責。那麼，這種無形的公共輿論是否能夠形成一種有效約束力量，這就取決於公共輿論對知識生產者影響的大小。如果公共輿論的力量能夠達到影響知識生產者（包括學者和單位）獲取資源的程度，那麼就能夠發揮輿論監督的社會功能。

基於這樣的理論邏輯，本文試圖檢驗2018年的校友呼籲書事件對胡鞍鋼教授是否產生了實質性的影響，即影響了胡教授的科研產出和學術影響力。如果實質性的影響的確存在，則意味著公共輿論有進一

步影響知識生產者資源獲取的可能性。那麼傳統認為社會在與學術之間的互動關係上居於被動地位的觀點就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也就意味著，社會可以更加積極地通過公共輿論有效地監督學術界履行「社會良心」的公共職能。

研究設計

研究方法

要檢驗社會性事件對學者科研產出與學術影響力的影響效應，比較直觀的思路是比較事件前後學者的科研產出與學術影響力是否發生巨大差異。

在經濟學、社會學中，常用雙重差分法 (difference-in-difference method, DID)、斷點迴歸設計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 RDD)、傾向值匹配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 進行政策效果評估。然而，DID、RDD、PSM並不適用於實驗組僅包含一個實驗物件的情況(蘇治、胡迪，2015；連玉君、李鑫，2022)。合成控制法 (synthetic control methods, SCM) 是一項針對個案的政策效果評估技術，該方法由Abadie等人(2010)在改進雙重差分法的基礎上提出。這一非參數方法不僅能夠避免雙重差分法選擇對照組時的主觀隨意性，還可以解決事件影響的內生性問題。其基本思路是：將受到某事件影響的案例列為實驗組，其餘未受該事件影響的案例全部歸入對照組，然後在對照組中尋找與事件發生前的實驗組案例相似的物件，賦予它們不同的權重，加權平均後得到一個合成控制的案例作為實驗組的反事實結果。實驗組與合成控制組在事件發生之後的指標差距即為該事件產生的效應。Abadie與Gardeazabal (2003) 最早將SCM用於分析恐怖活動對西班牙巴斯克地區經濟發展的影響，之後又探討了美國加利福尼亞州1989年頒佈的煙草消費稅法對香煙消費量的影響 (Abadie et al., 2010)。

近年來，國內各領域的學者拓展了SCM的不同應用場景。劉甲炎和范子英(2013)運用該方法估計房產稅對試點城市房價的影響，楊經國等人(2017)使用該方法探討了我國設立經濟特區所帶來的經濟增長效應，劉鑫橋(2022)使用該方法研究大學遷入是否能促進所在地方的

經濟增長，周娜（2019）使用該方法研究《四川公共圖書館條例》的實施對四川省公共圖書館的平均經費的促進效應，姚鵬等人（2021）使用該方法檢驗社科期刊資料公開制度對期刊影響力的提升效應。這些研究展示了SCM在個案試點政策效果評估中的適用性和有效性，2018年清華校友公開信事件對胡鞍鋼教授的影響正符合個案試點政策評估的使用條件。

本研究利用SCM擬合成與胡鞍鋼教授匹配的合成控制組，通過胡教授科研績效的真實值與合成值之間的差異來進行反事實分析，量化分析校友公開信事件對胡教授影響的淨效應。

資料來源與變數測量

本文以教育部長江學者獎勵計劃中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的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作為控制組的樣本庫，以產生與胡鞍鋼教授相對匹配的控制組。這一計劃始於1999年，至2018年下半年評選名單不再公開。本研究利用維基百科中的「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列表」，¹² 檢索列表中人文社科領域所有的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在CSSCI資料庫中的發文量和被引量。利用CSSCI資料庫檢索某位學者的被引量時，該系統不提供根據作者所在機構進行篩選的功能，因此，我們刪除了一些容易產生重名的學者（如北京大學劉偉教授、西南大學李紅教授等），避免被引次數會遠高於其真實值的情況。此外，為了提升擬合效果，本文排除了總發文量和總被引量與胡鞍鋼教授差距過大的學者，如山東大學傅有德教授、中山大學黃仕忠教授等。最後確定了1999至2017年間51位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作為控制組樣本，詳細名單、學校與專業參考附錄一。

為了更為完整地展示該事件對胡鞍鋼教授的影響，本文確定了兩倍觀察時段（即2018年之前的8年和之後4年）。我們利用胡鞍鋼教授的實驗組與控制組共51名學者自2010至2022年間在CSSCI資料庫中的發文、被引的面板資料進行合成控制分析。資料收集時間為2023年10月1日至2023年10月10日。

在文獻計量學領域，發文量和被引量是最為常用的衡量學者個體科研績效的指標，在進行文獻生產規律擬合時常使用指標的累計數。

因此，本研究的因變數為學者於2010至2022年間每年在CSSCI來源期刊上發表署名論文的累計數（簡稱「累計發文量」），以及每年排除自引後的總被引量的累計數（簡稱「累計被引量」）。在資料分析時，對於發文量，本文使用學者於2010至2022年間以第一作者在CSSCI來源期刊上的累計發文量（簡稱「一作累計發文量」）和 $t-1$ 時間的「累計發文量」來進行擬合，同時加入2011、2014、2017年的「累計發文量」作為協變數來提高實驗組與控制組在事件發生之前的擬合精度；對於被引量，我們使用學者的「累計發文量」和「一作累計發文量」來進行擬合，同時加入2011、2014、2017年的「累計被引量」作為協變數來提高擬合精度。由於發文量和被引量是計數資料，我們將所有預測變數與因變數的數值加一進行對數處理。

資料分析

構建合成控制組

本文在Stata 15上利用Abadie等人（2015）開發的Synth套裝程式來構建合成控制組。合成權重的選擇標準是使事件發生之前實驗組與控制組間的均方預測誤差最小化，表一顯示了最終得到的合成控制組中被選入學者所佔的權重。可見，在擬合發文量方面，有任保平、張康之、柯平和陳衛東四位學者進入合成控制組，權重分別佔68.0%、16.5%、11.2%、4.4%；在被引量方面，有賀雪峰、沈坤榮與周黎安三位學者進入合成控制組，權重分別佔53.5%、30.2%、16.4%。上述兩個合成控制組的權重值相加均為1。

表一 合成控制組中入選學者所佔權重

控制組樣本	合成發文量 (%)	控制組樣本	合成被引量 (%)
任保平	68.0	賀雪峰	53.4
張康之	16.5	沈坤榮	30.2
柯平	11.2	周黎安	16.4
陳衛東	4.4	/	/
總權重	100.0	總權重	100.0

我們利用表一中的權重組合繼續進行模型的估計。表二對比了事件發生之前五個預測變數真實值與合成值的平均值。資料顯示，無論是發文量還是被引量，五個預測變數的合成值與真實值之間的差距極小，這表明因變數的真實值與合成值的擬合程度較高，合成值可以成為真實值良好的反事實對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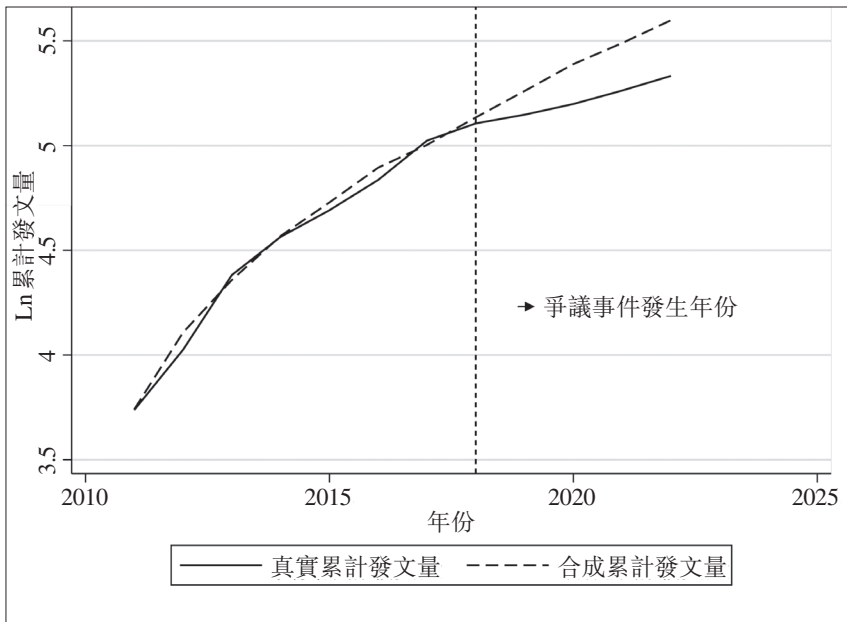
表二 事件發生前預測變數真實值與合成值的平均值

預測變數	Ln (累計發文量) (篇)		預測變數	Ln (累計被引量) (次)	
	真實值	合成值		真實值	合成值
Ln (上一年累計發文量)	4.20	4.20	Ln (累計發文量)	4.30	3.50
Ln (一作累計發文量)	3.96	3.90	Ln (一作累計發文量)	3.80	3.10
Ln (2011 累計發文量)	3.74	3.74	Ln (2011 累計被引量)	5.73	5.79
Ln (2014 累計發文量)	4.56	4.57	Ln (2014 累計被引量)	6.85	6.85
Ln (2017 累計發文量)	5.02	5.00	Ln (2017 累計被引量)	7.50	7.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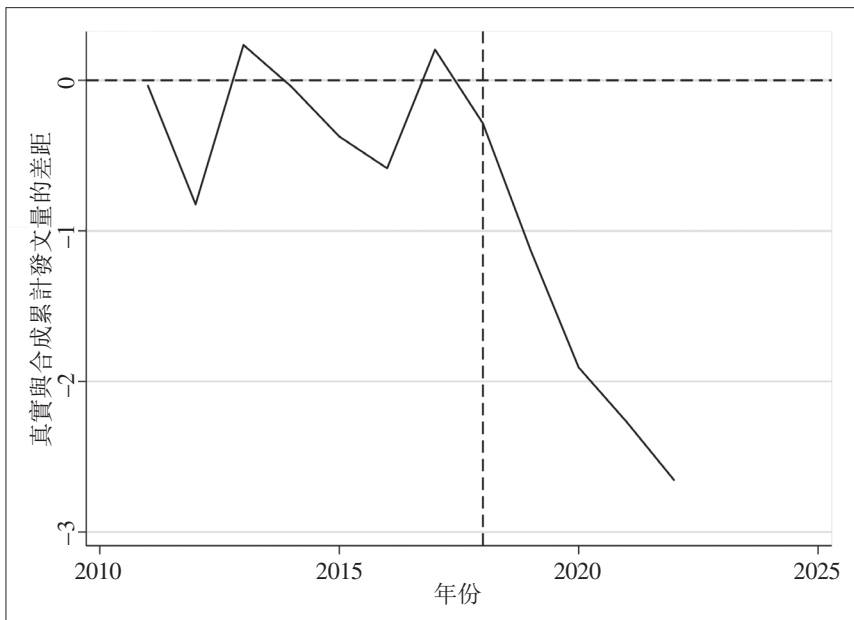
合成控制模型初步分析結果

圖一和圖二顯示了2018年事件對胡教授在發文量上影響效果的趨勢對比。由圖一可知，2018年之前累計發文量的合成值與真實值之間雖略有波動，但二者的走勢幾乎一致。這說明合成值可以反映2018年之前真實值的變動趨勢，擬合效果較好。因此可以推斷，合成控制組的走勢可以作為真實累計發文量的反事實估計，其在2018年之後的軌跡能夠代表未受到事件影響的胡鞍鋼教授的累計發文量。2018年之後，累計發文量的真實值在四年間均低於合成值，且二者差距越來越大（見圖一）。在2018年之前，真實值與合成值的差值在0上下波動，且波動幅度在0.1之內；2018年之後這一差距超過了0.1且有持續擴大的趨勢（見圖二）。綜上所述，可以推斷出2018年事件對胡鞍鋼教授的累計發文量的增速產生了負面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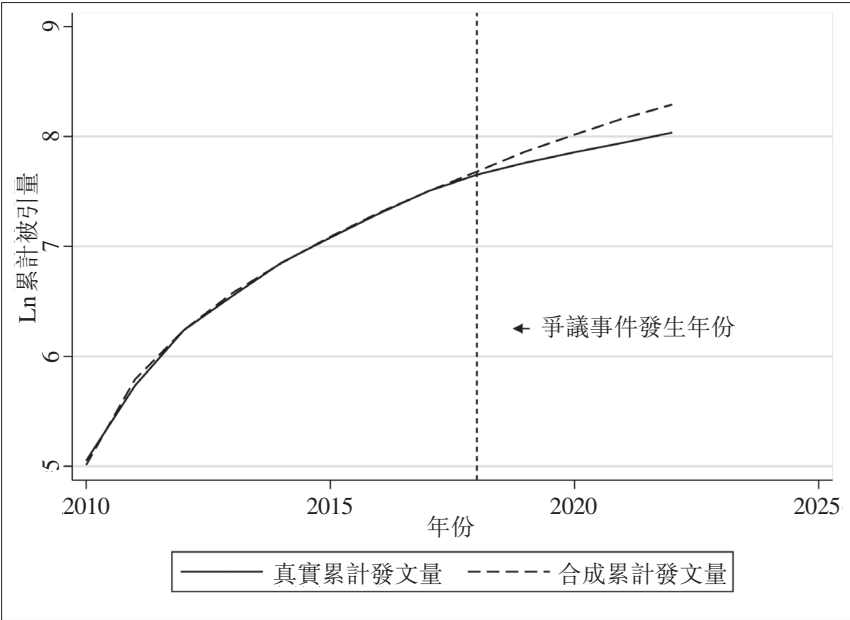
圖一 胡鞍鋼教授真實與合成累計發文量的趨勢對比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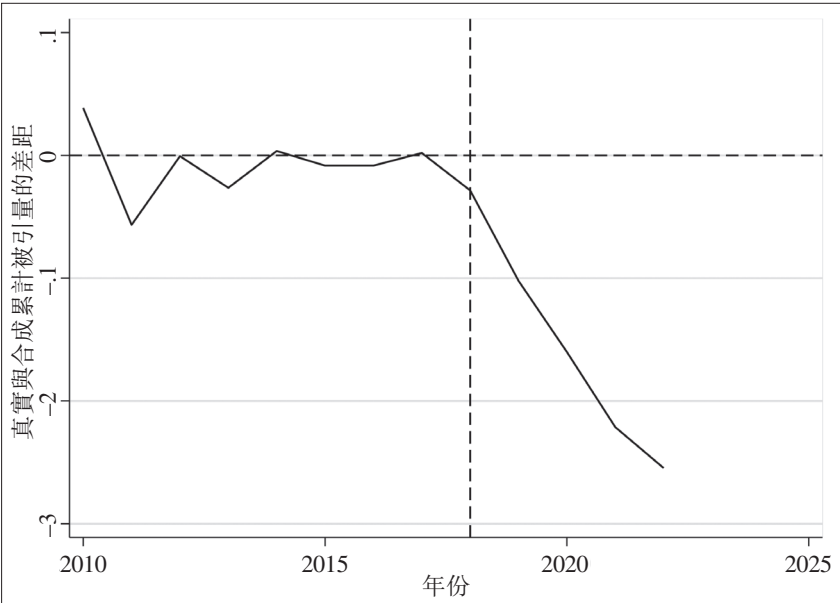
圖二 胡鞍鋼教授真實與合成累計發文量的差距圖



圖三 胡鞍鋼教授真實與合成累計被引量的趨勢對比圖



圖四 胡鞍鋼教授真實與合成累計被引量的差距圖



圖三和圖四顯示了2018年事件對胡鞍教授在被引量上影響效果的趨勢對比。由圖三可知，累計被引量的合成值與真實值在2018年之前的軌跡幾乎重合，因此可以推斷合成累計被引量在2018年之後能夠作為真實累計被引量的反事實估計，代表在未受到該事件影響的情況下胡鞍鋼教授的累計被引量趨勢。2018年之後，累計被引量的真實值一直低於合成值，且二者差值有持續擴大趨勢（見圖三）。在2018年事件發生之前，真實值與合成值的差值在0上下波動，且波動幅度在0.1之內；在2018年事件發生之後，真實值呈現持續下降趨勢，到2022年時與合成值的差距達到了0.25左右（見圖四）。因此，可以推斷出2018年的事件對胡鞍鋼教授的累計被引量的增速同樣產生了負面影響。

穩健性檢驗與分析

通過圖一至圖四可以初步推斷，2018年事件對胡鞍鋼教授的科研績效產生了負面影響。為了提升合成法控制法的穩健性，排除未觀測到的隨機干擾因素對政策效果的干擾，Abadie等人(2015)提出了一系列安慰劑檢驗方法以確定合成控制法所得結果是否具備統計上的顯著性，最常用的方法是實驗組特殊變換和排列檢驗。

實驗組特殊變換

本文首先利用Abadie與Gardeazabal(2003)提出的實驗組特殊變換法來檢驗結果的穩定性。其基本思路是：選擇一位沒有像胡鞍鋼教授一樣經歷過類似事件的學者，進行同樣的合成控制分析，判斷該學者的累計發文量、累計被引量的真實值與合成值的擬合走勢在2018年前後是否與胡鞍鋼教授的擬合走勢相似。如果備選學者的真實值與合成值的走勢與胡鞍鋼教授不相似，說明不存在未觀測到的偶然因素影響學者科研績效的變化趨勢，進而說明2018年事件對胡鞍鋼教授科研績效的影響具有穩健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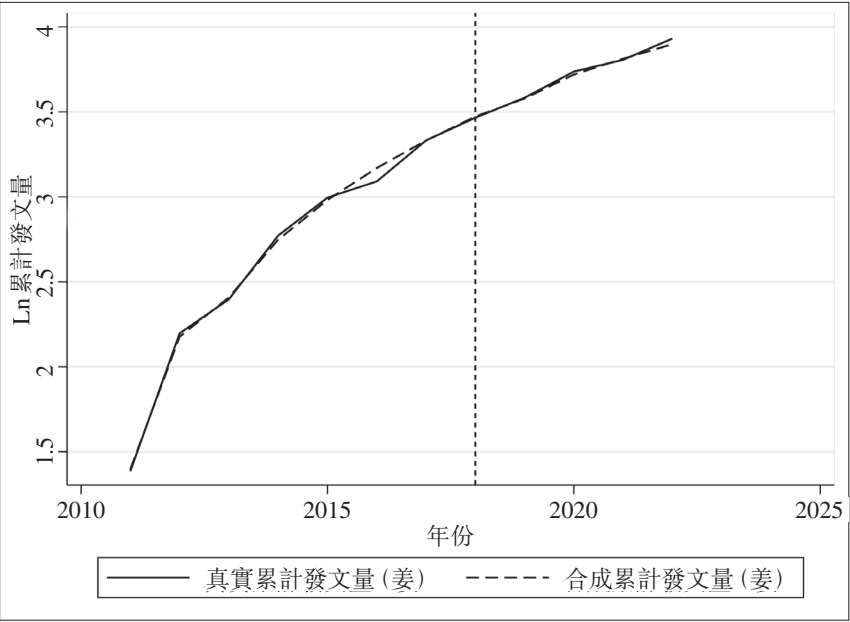
按照上述思路，我們以差異最大化原則，選擇在合成控制組中權重佔比最高和未能入選合成控制組的兩位學者作為實驗組變換物件。權重佔比最大表明在合成控制組中該學者在2018年之前的科研績效趨勢與胡鞍鋼教授最為相似，最適合作為胡教授在2018年之後的反事實評估；未能入選合成控制組，則意味著該學者科研績效趨勢與胡鞍鋼教授差距巨大。通過對兩種極端情況學者進行合成控制分析，可以檢驗合成控制分析結果的穩健性。

在累計發文量方面，我們選擇未能入選合成控制組的姜曉萍教授與權重佔比最大的任保平教授；在累計被引量方面，我們選擇未能入選合成控制組的閻學通教授與權重佔比最大的賀雪峰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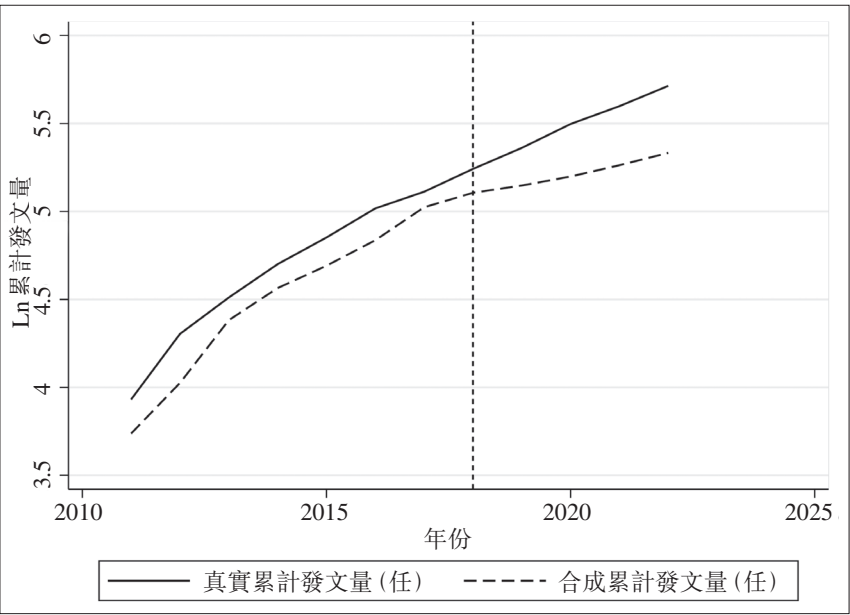
圖五、圖六分別顯示姜曉萍教授、任保平教授在累計發文量上的合成控制分析結果。如圖五所示，姜教授的真實值與合成值的軌跡幾乎重合，擬合效果較好；而且，在2018年前後，真實值和合成值之間的差異未發生顯著的變化。如圖六所示，任保平教授的合成值雖然未能完全擬合真實值，但是兩者的軌跡趨勢基本一致，而且在2018年之後真實值一直保持大於合成值的趨勢。而胡鞍鋼教授的累計發文量軌跡顯示，如圖一所述在2018年之後真實值低於合成值。

圖七、圖八分別呈現了閻學通教授、賀雪峰教授在累計被引量上的合成控制分析結果。圖七顯示，閻學通教授累計被引量的真實值與合成值幾乎完全重合，在2018年前後的走勢沒有發生顯著變化。圖八顯示，賀雪峰教授累積被引量的真實值與合成值在2017年之前幾乎重合，2017之後出現真實值高於合成值且差距有逐步擴大的趨勢。如圖三所述，這一特點與胡鞍鋼教授在被引量上表現出的特點顯著不同。通過百度百科上對賀雪峰教授工作經歷的簡介可知，賀雪峰教授於2017正式加盟武漢大學並擔任社會學系主任一職。在我國的學術生態下，可以推定賀雪峰教授在累計被引量上的變化，受到其從華中科技大學轉會到武漢大學一事的重要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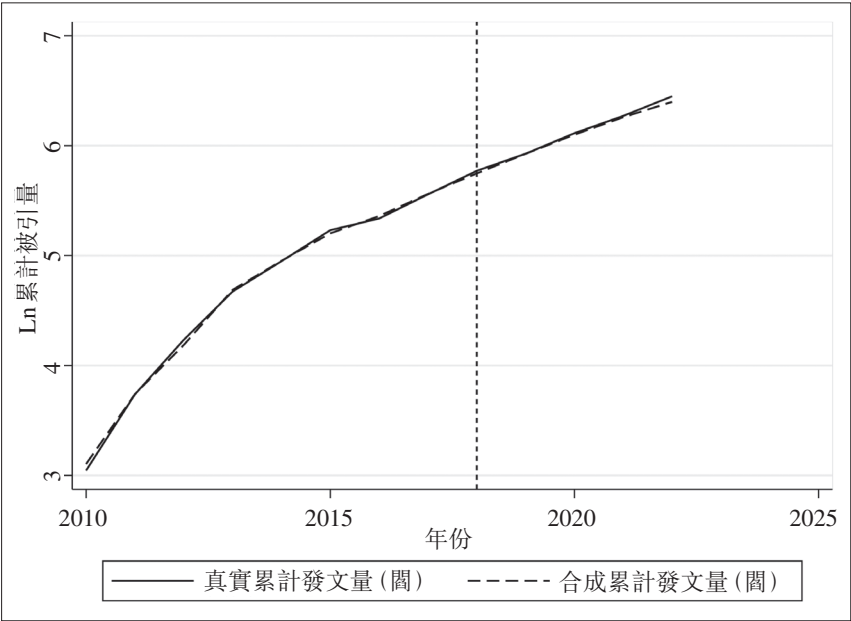
圖五 姜曉萍教授真實與合成累計發文量的對比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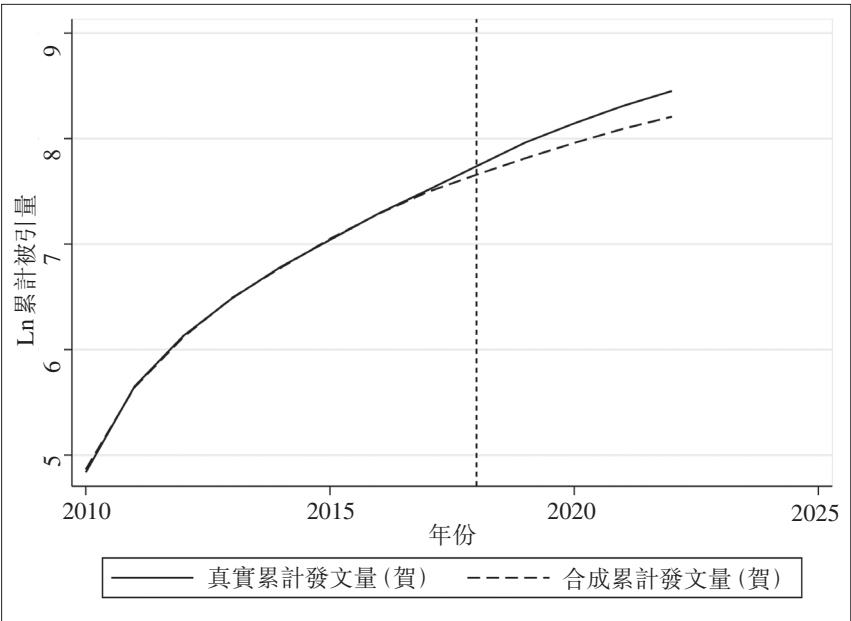
圖六 任保平教授真實與合成累計發文量的對比圖



圖七 閻學通教授真實與合成累計被引量的對比圖



圖八 賀雪峰教授真實與合成累計被引量的對比圖



對因變數的特殊變換結果顯示，四位學者的真實值與合成值雖然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擬合不佳，但是在2018年前後並未發生與胡鞍鋼教授類似的走勢。這表明使用合成控制法分析2018年清華校友事件對胡鞍鋼教授科研績效的影響，有效排除了沒有觀測到的偶然因素的混雜效應，校友事件對胡鞍鋼教授科研績效的變化之間存在顯著的因果關係。

排列檢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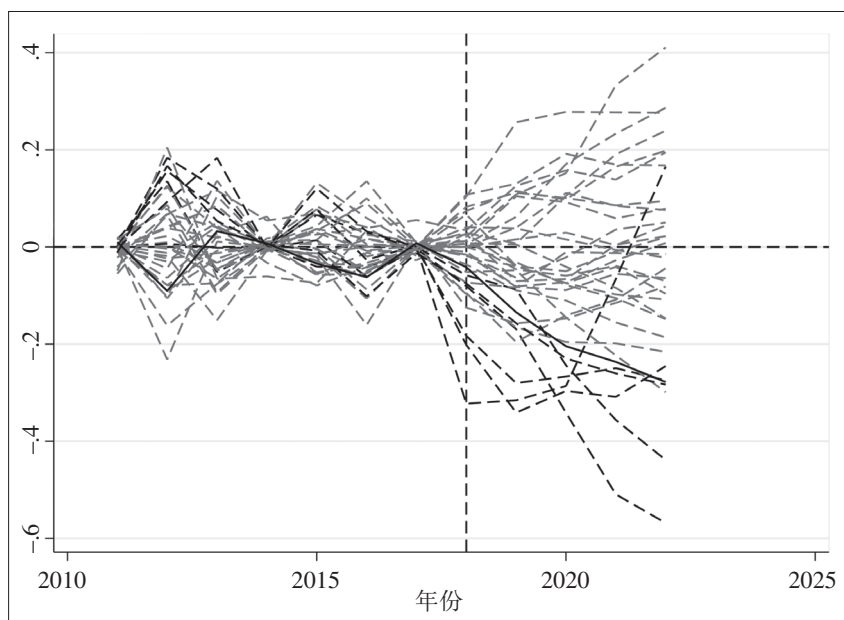
排列檢驗 (permutation test) 是Abadie等人(2015)提出的另一種安慰劑試驗方法，它與秩檢驗法 (rank test) 的思路類似。排列檢驗法假設控制組中的學者也在2018年遭遇過類似的社會爭議事件，將合成控制法逐一運用於控制組中的每一個物件，得出處理效應在控制組樣本中的效果。對於本文51位控制組個體樣本，我們可以得出51個對應的事件效應估計，從而能對未遭遇事件學者的科研績效構建出估計影響的分佈。之後將胡鞍鋼教授的處理效應曲線加入到上述分佈中，如果該曲線處於整體分佈的尾部，意味著我們可以拒絕事件對胡鞍鋼教授負面影響不顯著的原假設；進而表明，胡鞍鋼教授科研績效的降低並非偶然現象，確實是受到了校友事件的影響。

排列檢驗需要對控制組中的學者逐一進行合成控制分析，但如果某學者的合成值在2018年前與真實值的擬合效果不佳，則說明該學者並非優良的控制組樣本。此時若繼續將該學者的處理效應曲線加入到最終分佈中與胡鞍鋼教授進行比較，所得出的推論便是不可靠的。因此，我們刪除了控制組中平均預測誤差 (mean squared prediction error, MSPE) 為胡鞍鋼教授兩倍以上的學者，以餘下擬合效果相對較好的學者組成新的控制組。之後對胡鞍鋼教授與新的控制組樣本進行排列檢驗分析，最終得到的處理效應分佈圖 (見圖九、圖十)。

圖九是因變數為累計發文量的處理效應分佈圖，此處我們剔除了17位MSPE是胡鞍鋼教授兩倍以上 ($MSPE > .10$) 的學者，構建餘下34位學者和胡鞍鋼教授的處理效應曲線分佈圖。由圖可知，在2018年之後，有6位控制組學者的處理效應曲線 (黑色虛線) 幾乎全程位於胡鞍鋼教授的處理效應曲線 (黑色實線) 之下。也就是說，在2018事件對胡

鞍鋼教授累計發文量增速無影響的零假設下，從餘下34位學者組成的新控制組中隨機抽取一位學者，要得到胡鞍鋼教授的處理效應曲線的機率有17.6%（6/34）。此機率未能達到拒絕零假設的最低要求（10%），因此推斷出，2018年事件對胡鞍鋼教授科研產出影響並不具有顯著的因果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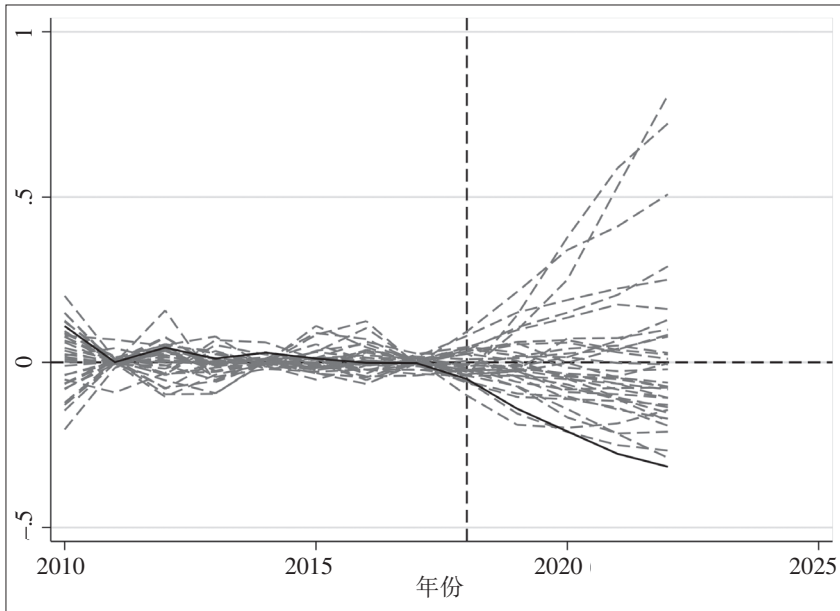
圖九 胡鞍鋼教授與控制組累計發文量的處理效應分佈圖



圖十是因變數為累計被引量的處理效應分佈圖。同理，我們刪除了17位MSPE是胡鞍鋼教授兩倍以上（ $MSPE > .08$ ）的學者，構建餘下34位學者和胡鞍鋼教授的處理效應分佈圖。如圖所示，絕大多數學者的累計被引量在2018年之前具有良好的擬合效果；在2018年之後，控制組樣本中多數曲線仍在基準線0附近波動，而胡鞍鋼教授的曲線一直在向負方向遠離基準線0，且曲線位於34位學者集中分佈區域的下方，在2020年之後則一直處於分佈區域的最下方。因此，可以認為胡教授的處理效應曲線始終位於分佈的尾部。在總體上，若從34位學者組成的新控制組中隨機抽取一位，得到的處理效應曲線與胡鞍鋼教授

相似的概率僅有 2.94% (1/34)，小於常用拒絕零假設的概率 (10%)。因此可以拒絕零假設，說明 2018 年事件與胡鞍鋼教授累計被引量增速降低之間存在顯著的因果效應。

圖十 胡鞍鋼教授與其他學者關於累計被引量的處理效應分佈圖



綜上所述，2018 年事件對胡鞍鋼教授的累計發文量的增速產生負向影響未能完全通過兩種穩健性檢驗，未達到顯著水準；但是，對胡鞍鋼教授的累計被引量的增速卻完全通過兩種穩健性檢驗，產生了顯著的負向影響。也就是說，2018 年清華校友事件與胡教授在 2018 年之後每年的被引量的減少之間存在著顯著的因果效應。

結語

Weber 曾經在《學術與政治》中強調，科學應是價值無涉的，科學家理應懷有「以學術為業」的情懷，做到「知識上的誠實」(2004: 26)。然而，隨著學術在戰時被要求配合政治在戰後得到延續、企業通過科

學研究與試驗發展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向科研不斷擴張、以及現代科學研究對資源的依賴性越來越強，Weber 之後的學術正漸漸無法擺脫外界因素的影響，學術與政治、資本等力量保持著一種看似鬆散但又有實質性互動的格局 (閻光才，2010)。即使是身處純粹客觀的自然科學中，科學家也要學會與政治、商業打交道，通過圈外力量的輸血來保持或強化自身在學術界的活力與影響力。這必然導致學術開始遵循市場交換邏輯，將研究服務於委託人的利益，進而威脅到學術的自主性和客觀性，甚至會淪為不良委託主體的幫兇。與政治和資本相較，社會在與學術的互動中處於弱勢地位，然而社會卻事關最廣大群體的利益，理應成為學術的終極委託人。

本研究以2018年胡鞍鋼事件為案例，通過分析胡鞍鋼教授學術生涯的起落沉浮，揭示政治、社會與知識生產者三者在中國學術生態中的互動關係。案例顯示，學者將服務於政治需求作為自己的研究旨趣時，會極大提升自己的學術影響力並使自己獲得巨大收益。社會在與學術的互動過程中，並非完全處於被動地位。社會可以通過公眾輿論對學者服務於政治的知識生產活動進行一定的輿論監督，這種監督會影響學者在學術界的聲譽及學術影響力。資料顯示，胡鞍鋼教授在經歷了2018年清華校友公開信事件之後，其科研產出有所下降，但與事件發生之前並不存在顯著差異；然而，其被引次數顯著受到了該事件的影響，低於事件發生之前，而且這種差異會隨著時間不斷增大。2018年校友事件對胡鞍鋼教授的科研產出和學術影響力產生了不同的因果效應，我們認為主要原因在於：科研產出的高低主要受到的學者個體及其研究團隊努力程度的影響，這是一個主體可控的行為；而學術影響力（即被引次數）是一個主體無法有效控制的、學術界集體選擇行為的結果。從引用動機的角度來看（劉宇等，2018），2018年事件極大地削弱了胡鞍鋼教授在學術界和社會的聲譽，學術權威的光環效應不再；學術界之前存在的因尊崇權威而產生的對胡鞍鋼教授的引用必然大幅度下降。

與自然科學不同，人文社會科學的學科屬性使其研究不僅需要面向學術同行和國家的政治需求，同樣也需要面向社會公眾。人文社會

科學的研究成果能夠在社會公眾中得到廣泛認可，形成信譽度、權威性、影響力和號召力是評價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價值的重要維度(姚申，2013)，甚至是終極標準。胡鞍鋼事件表明，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學者的學術研究需要秉持價值中立、實事求是的基本原則，不能一味迎合政治需求進行知識生產。否則，社會必將通過公共輿論對學者的知識生產進行監督，促使學術界做出符合事實的研究成果。知識份子需要秉持「社會良知」基本使命，把學術研究建立在事實的基礎上，進而服務於社會需求和政治需求，這樣才可以避免學術研究淪為「象牙塔」裏的自說自話或為政治服務的工具，向社會公眾和國家傳播準確的、有價值的資訊，不辜負社會對學術的價值期待。

披露聲明

本文研究者未報告潛在的利益衝突。

Disclosure Statement

No potential conflict of interest was reported by the authors.

研究經費資助

本文未獲研究項目經費資助。

Funding

This article was not funded by any project grant.

ORCID

劉宇 (Yu LIU) <https://orcid.org/0000-0002-2233-8403>

孫凱騁 (Kaicheng SUN) <https://orcid.org/0009-0002-4839-1226>

註釋

- 1 BBC (2018年8月3日)。〈胡鞍鋼被諷「給帝王唱讚歌」千人聯名要求清華將其開除〉，取自BBC，<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45058201>。
- 2 百度百科 (2024年3月26日)。〈胡鞍鋼〉，取自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3%A1%E9%9E%8D%E9%92%A2/5591081>。
- 3 維基百科 (2024年3月26日)。〈胡鞍鋼〉，取自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3%A1%E9%9E%8D%E9%92%A2>。
- 4 鳳凰新聞 (2018年8月6日)。〈胡鞍鋼是這樣煉成的〉，取自鳳凰新聞，<https://news.ifeng.com/59648829/news.shtml?&back>。
- 5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2024年3月26日)。〈胡鞍鋼〉，取自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https://www.sppm.tsinghua.edu.cn/info/1203/7496.htm>。
- 6 張敬偉 (2018年8月16日)。〈從胡鞍鋼現象看中國知識階層劣根性〉，取自察哈爾評論，<http://charhar.org.cn/newsinfo.aspx?newsid=13636>。
- 7 望山 (2018年8月4日)。〈理性看待「胡鞍鋼」現象，也許支持他的人會越來越多〉，取自觀察者網，<https://user.guancha.cn/main/content?id=30148>。
- 8 法國國際廣播電台 (2024年3月26日)。〈清華大學教授胡鞍鋼日子不好過〉，取自法國國際廣播電台，<https://www.rfi.fr/cn/%E4%B8%AD%E5%9B%BD/20180811-%E6%B8%85%E5%8D%8E%E5%A4%A7%E5%AD%A6%E6%95%99%E6%8E%88%E8%83%A1%E9%9E%8D%E9%92%A2%E6%97%A5%E5%AD%90%E4%B8%8D%E5%A5%BD%E8%BF%87>。
- 9 搜狐網 (2019年2月1日)。〈國家智庫換屆：叫囂「中國已全面超越美國」的胡鞍鋼不再是成員！〉，取自搜狐網，https://www.sohu.com/a/292783081_109305。
- 10 光明日報 (2013年2月4日)。〈學者胡鞍鋼的追求〉，取自光明日報，https://epaper.gmw.cn/gmrb/html/2013-02/04/nw.D110000gmrb_20130204_1-09.htm?div=-1。
- 11 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 (2024年3月27日)。〈胡鞍鋼〉，取自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http://www.iccs.tsinghua.edu.cn/expert_info/583.html。
- 12 維基百科 (2023年10月1日)。〈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列表〉，取自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5%BF%E6%B1%9F%E5%AD%A6%E8%80%85%E7%89%B9%E8%81%98%E6%95%99%E6%8E%88%E5%88%97%E8%A1%A8>。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Chinese Section)

- 任劍濤(2005)。〈國家、機構與生產者：三邊關係與知識生產〉。鄧正來(編)，*《中國書評》*，頁110–119。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Ren, J. (2005). State, institution, and producer: Trilateral relations and knowledge production. In Z. Deng (Ed.). *China Review* (pp. 110–119).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 任劍濤(2007)。〈學術貧困、學者自律與員警意識〉。《社會科學論壇(學術評論卷)》，第6期，頁112–123。
- Ren, J. (2007). Academic poverty, academic self-discipline, and police awareness. *Tribune of Social Sciences*, 6, 112–123.
- 任劍濤(2021)。〈會社、社會與國家：現代中國的社會運勢與國家突起〉。《學術界》，第7期，頁24–49。
- Ren, J. (2021). Social organization, society, and state: The social fortune and national emergence of modern China. *Academics*, 7, 24–49.
- 李江、姜明利、李玥婷(2014)。〈引文曲線的分析框架研究——以諾貝爾獎得主引文曲線為例〉。《中國圖書館學報》，第2期，頁41–49。
- Li, J., Jiang, M., & Li, Y. (2014). Citation curves of Nobel laureates.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 41–49.
- 李鋒亮、王雲斌、何光喜(2016)。〈什麼因素影響了大學教師的學術發表〉。《教育發展研究》，第11期，頁14–20。
- Li, F., Wang, Y., & He, G. (2016). Which factors affect the academic publications of university teachers. *Research in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11, 14–20.
- 金觀濤、劉青峰(2010)。《興盛與危機：論中國社會的超穩定結構》。法律出版社。
- Jin, G., & Liu, Q. (2010). *Prosperity and crisis: On the super-stable structure of Chinese society*. Legal Press.
- 拉圖爾、伍爾加(2004)。《實驗室生活：科學事實的建構過程》(刁小英、張伯霖譯)。東方出版社。(原書Latour, B., & Woolgar, S. [1986]. *Laboratory life: 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fact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Latour, B., & Woolgar, S. (2004). *Laboratory life: 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facts* (X. Diao & B. Zhang, Trans.). Oriental Publishing House.
- 周娜(2019)。〈地方性專門法規與公共圖書館經費保障——基於合成控制法的分析〉。《圖書館論壇》，第11期，頁148–154。

- Zhou, N. (2019). Local regulations and financial guarantee for public libraries: An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synthetic control method. *Library Tribune*, 11, 148–154.
- 胡鞍鋼 (1997)。〈關於中美關係及其對策的若干建議〉。《清華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期，頁16–18。
- Hu, A. (1997). Several suggestions on China-U.S. relat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Journal of Tsinghua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3, 16–18.
- 姚申 (2013)。〈公眾認可、公信力與人文社會科學評價〉。《雲夢學刊》，第4期，頁7–8。
- Yao, S. (2013). Public recognition, credibility, and evaluation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Journal of Yunmeng*, 4, 7–8.
- 姚鵬、牛靖、李傳健 (2021)。〈資料公開能提高期刊影響力嗎？——以社科期刊A為例〉。《情報資料工作》，第3期，頁105–112。
- Yao, P., Niu, J., & Li, C. (2021). Can data disclosure increase the influence of journals? Taking social sciences periodicals: A for an example. *Information and Documentation Services*, 3, 105–112.
- 高志、陳蘭傑、張志強 (2016)。〈頂尖科學家的學術影響力變化規律研究進展〉。《圖書情報工作》，第6期，頁135–141。
- Gao, Z., Chen, L., & Zhang, Z. (2016). Research review on trends of academic impact of top scientists.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6, 135–141.
- 馬克斯·韋伯 (2004)。《學術與政治》(馮克利譯)。商務印書館。(原書 Weber, M. [1919]. *Wissenschaft Als Beruf & Politik Als Beruf*. Vortrag an der Universität München 1919.)
- Weber, M. (2004). *Academia and politics* (K. Feng, Trans.). The Commercial Press.
- 秦曉、金耀基、韋森、新望、林崗、高全喜、許紀霖 (2009)。〈社會轉型與現代性問題座談紀要〉。《讀書》，第7期，頁7–32。
- Qin, X., Jin, Y., Wei, S., Xin, W., Lin, G., Gao, Q., & Xu, J. (2009). Summary of the symposium on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modernity issues. *Reading*, 7, 7–32.
- 孫國東 (2018)。〈公共商談與學術研究的公共性——兼談社會科學自主性的兩個向度〉。《中國社會科學評價》，第1期，頁16–24。
- Sun, G. (2018). Public discourse and the public feature of academic research: On two dimensions of social science autonomy. *China Social Science Review*, 1, 16–24.

- 連玉君、李鑫 (2022)。〈合成控制法中的安慰劑檢驗改進研究——基於准標準化轉換的統計推斷〉。《統計研究》，第8期，頁115–128。
- Lian, Y., & Li, X. (2022). Improved placebo test for synthetic control method: Inference with Quasi-standardized transformation. *Statistical Research*, 8, 115–128.
- 張錫金 (2001)。〈知識份子的角色：學術與政治之間〉。《學術界》，第5期，頁161–168。
- Zhang, X. (2001). The role of intellectuals: Between academia and politics. *Academics*, 5, 161–168.
- 許紀霖 (1988)。〈關於知識份子的斷想——讀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讀書》，第6期，頁103–110。
- Xu, J. (1988). Reflections on intellectuals: Reading Yingshi Yu's "Scholars and Chinese Culture." *Reading*, 6, 103–110.
- 許成綱 (2021)。《探索的歷程》。中信出版社。
- Xu, C. (2004). *The process of exploration*. Citic Press.
- 渠敬東 (2012)。〈項目制：一種新的國家治理體制〉。《中國社會科學》，第5期，頁113–130。
- Qu, J. (2012). Project system: A new system of state governance.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5, 113–130.
- 黃海剛、連潔 (2020)。〈職業流動提升了科學家的科研生產力嗎？〉。《清華大學教育研究》，第5期，頁127–135。
- Hu, H., & Lian, J. (2020). Does job mobility improve scientists' academic productivity? *Tsinghua Journal of Education*, 5, 127–135.
- 路風 (1989)。〈單位：一種特殊的社會組織形式〉。《中國社會科學》，第1期，頁71–88。
- Lu, F. (1989). Unit: A special form of social organization.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 71–88.
- 楊經國、周靈靈、鄒恒甫 (2017)。〈我國經濟特區設立的經濟增長效應評估——基於合成控制法的分析〉。《經濟學動態》，第1期，頁41–51。
- Yang, J., Zhou, L., & Zou, H. (2017). Evaluation of the economic growth effect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special economic zones in China: Analysis based on synthetic control method. *Economic Perspectives*, 1, 41–51.
- 楊希、李歡 (2021)。〈學術創業如何影響學者科研產出——以「雙一流」建設高校材料學科為例〉。《中國高教研究》，第3期，頁37–43。

- Yang, X., & Li, H. (2021). How does academic entrepreneurship affect academics' research output? Data from material faculties at "Double First-Class" construction universities. *China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3, 37-43.
- 鄧正來 (2000)。〈市民社會與國家知識治理制度的重構——民間傳播機制的生長與作用〉。《開放時代》，第3期，頁5-18。
- Deng, Z. (2000). Reconstruction of civil society and national knowledge governance system: The growth and role of folk communication mechanisms. *Open Times*, 3, 5-18.
- 鄧正來 (2004)。〈對知識份子「契合」關係的反思與批判——關於中國社會科學自主性的再思考〉。《天津社會科學》，第6期，頁4-11。
- Deng, Z. (2004). Reflection and criticism on the "fit" relationship with intellectuals: Rethinking the autonomy of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Tianjin Social Sciences*, 6, 4-11.
- 鄧正來 (2007)。〈學術自主性問題：反思和推進——〈學術與自主：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自序〉。《社會科學論壇（學術評論卷）》，第11期，頁38-41。
- Deng, Z. (2007). Reflection and promotion of academic autonomy: The preface of "Academic and Autonomou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n China." *Tribune of Social Sciences*, 11, 38-41.
- 劉甲炎、范子英 (2013)。〈中國房產稅試點的效果評估：基於合成控制法的研究〉。《世界經濟》，第11期，頁117-135。
- Liu, J., & Fan, Z. (2013). Evaluation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China's property tax pilot program: A study based on synthetic control method. *The Journal of World Economy*, 11, 117-135.
- 劉宇、張永娟、齊林峰、回勝男 (2018)。〈知識啟迪與權威尊崇：基於重複發表的引文動機研究〉。《圖書館論壇》，第4期，頁49-57。
- Liu, Y., Zhang, Y., Qi, L., & Hui, S. (2018). Knowledge enlightenment or authority adoration: An empirical study of citation motivation based on duplicate publications. *Library Tribune*, 4, 49-57.
- 劉宇、劉曉豔 (2022)。〈道德自律抑或組織約束？學術失信行為的影響因素研究〉。《圖書館雜誌》，第5期，頁4-13。
- Liu, Y., & Liu, X. (2022). Moral self-regulation or organizational discipline? A study of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academic dishonesty behavior. *Library Journal*, 5, 4-13.
- 劉鑫橋 (2022)。〈高等教育與區域經濟的互利共生——來自「京校外遷」的自然實驗證據〉。《清華大學教育研究》，第5期，頁103-113。

- Liu, X. (2022). Mutualism between higher education and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Quasi-natural experimental evidence based on “Universities Moving Outside Beijing.” *Tsinghua Journal of Education*, 5, 103–113.
- 鮑玉芳、馬建霞 (2015)。〈諾貝爾獎與科學家論文數量、被引頻次的相關性——基於2000–2010年諾貝爾化學、物理學獲獎者的實證研究〉。《圖書館理論與實踐》，第8期，頁40–45。
- Bao, Y., & Ma, J. (2015).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Nobel Prizes and the number of papers authored by scientists, as well as their citation frequency: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Nobel Prize winners in Chemistry and Physics from 2000–2010. *Library Theory and Practice*, 8, 40–45.
- 閻光才 (2010)。〈韋伯之後的學術與政治〉。《讀書》，第10期，頁34–41。
- Yan, G. (2010). Academia and politics after Weber. *Reading*, 10, 34–41.
- 蘇治、胡迪 (2015)。〈通貨膨脹目標制是否有效？——來自合成控制法的新證據〉。《經濟研究》，第6期，頁74–88。
- Su, Z., & Hu, D. (2015). Is inflation targeting effective? New evidence from the synthetic control methods.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6, 74–88.

英文部分 (English Section)

- Abadie, A., Diamond, A., & Hainmueller, J. (2010). Synthetic control methods for comparative case studies: Estimating the effect of California’s tobacco control program.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105(490), 493–505.
- Abadie, A., Diamond, A., & Hainmueller, J. (2015). Comparative politics and the synthetic control method.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9(2), 495–510.
- Abadie, A., & Gardeazabal, J. (2003). The economic costs of conflict: A case study of the Basque Countr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3(1), 113–132.
- Bakker, V. J., Baum, J. K., Brodie, J. F., Salomon, A. K., Dickson, B. G., Gibbs, H. K., Jensen, O. P., & McIntyre, P. B. (2010). The changing landscape of conservation science fund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Conservation Letters*, 3(6), 435–444.
- Bao, C., Zhao, X., Li, Y., & Li, Z. (2023). How to maintain sustainable research productivity: From talents mobility perspective. *Sustainability*, 15(15), 11506.
- Borjas, G. J., & Doran, K. B. (2015). Prizes and productivity: How winning the fields medal affects scientific output.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50(3), 728–758.
- Bricongne, J. C. (2014). Do prizes in economics affect productivity? (Working paper no. 24). *HAL Open Science*. From <https://sciencespo.hal.science/hal-03460488v1/document>.

- Çakir, D. C., & Richter, S. (2023). Is there a Nobel Prize effect? Translations after the Nobel Prize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ranslations of germanophone literature's Nobel laureates. *Poetics*, 100, 101827.
- Chan, H. F., Frey, B. S., Gallus, J., & Torgler, B. (2014). Academic honors and performance. *Labour Economics*, 31, 188–204.
- Dong, X., Lin, K., Gao, Y., & Hu, B. (2023). Nobel Citation Effects on scientific publications: A case study in physics. *Information Processing & Management*, 60(4), 103410.
- Hou, J., Zheng, B., Zhang, Y., & Chen, C. (2021). How do Price medalists' scholarly impact change before and after their awards? *Scientometrics*, 126(7), 5945–5981.
- Ibrahim, B. (2020). The role of Egyptian State Awards in changing researchers' performance in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ctor. *Research Evaluation*, 29(2), 171–190.
- Liao, C. H. (2021). The Matthew effect and the halo effect in research funding. *Journal of Informetrics*, 15(1), 101108.
- Liu, X., Yu, M., Chen, D.-Z., & Huang, M.-H. (2018). Tracking research performance before and after receiving the Cheung Kong Scholars award: A case study of recipients in 2005. *Research Evaluation*, 27(4), 367–379.
- Mazloumian, A., Eom, Y.-H., Helbing, D., Lozano, S., & Fortunato, S. (2011). How citation boosts promote scientific paradigm shifts and Nobel Prizes. *PloS one*, 6(5), e18975.
- Merton, R. K. (1968). The Matthew effect in science: The reward and communication systems of science are considered. *Science*, 159(3810), 56.
- Petersen, A. M., Fortunato, S., Pan, R. K., Kaski, K., Penner, O., Rungi, A., Riccaboni, M., Stanley, H. E., & Pammolli, F. (2014). Reputation and impact in academic career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1(43), 15316–15321.
- Sohn, E. (2021). How local industry R&D shapes academic research: Evidence from the agricultural biotechnology revolution. *Organization Science*, 32(3), 675–707.

附錄一

姓名	所屬高校	研究領域	姓名	所屬高校	研究領域
陳振明	廈門大學	公共管理	邱澤奇	北京大學	社會學
薛瀾	清華大學	公共管理	閻學通	清華大學	國際關係
蘇竣	清華大學	公共管理	王正毅	北京大學	國際關係
黃賢金	南京大學	公共管理	劉志彪	南京大學	經濟學
林尚立	復旦大學	政治學	羅必良	華南農業大學	農業經濟管理
朱光磊	南開大學	政治學	郭慶旺	中國人民大學	財政學
鐘楊	上海交通大學	政治學	劉金全	吉林大學	數量經濟學
周光輝	吉林大學	政治學理論	沈坤榮	南京大學	政治經濟學
王浦劬	北京大學	政治學理論	任保平	西北大學	政治經濟學
鬱建興	浙江大學	政治學理論	姚洋	北京大學	國民經濟學
金太軍	蘇州大學	政治學理論	周黎安	北京大學	產業經濟學
任劍濤	清華大學	政治學	崔建遠	清華大學	法學
郭蘇建	復旦大學	政治學理論	王利明	中國人民大學	法學
張賢明	吉林大學	政治學理論	陳衛東	中國人民大學	訴訟法學
唐世平	復旦大學	國際政治學	趙旭東	中國政法大學	民商法
姜曉萍	四川大學	政治學理論	陳瑞華	北京大學	訴訟法學
燕繼榮	北京大學	政治學理論	張明楷	清華大學	刑法學
張鳳陽	南京大學	政治學理論	張康之	中國人民大學	行政管理
景軍	清華大學	社會學	陳國權	清華大學	企業管理學
李路路	中國人民大學	社會學	蘇新寧	南京大學	情報學
周曉虹	南京大學	社會學	劉彥隨	北京師範大學	土地資源管理
張文宏	上海大學	社會學	喻國明	中國人民大學	新聞傳播學
謝立中	北京大學	社會學	柯平	南開大學	圖書館學
翟學偉	南京大學	社會學	方創琳	新疆大學	城鄉規劃管理
賀雪峰	華科技大學	社會學	黃榮懷	北京師範大學	教育技術學
田毅鵬	吉林大學	社會學			

註：控制組共51位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按在維基百科上檢索到的先後順序排列。